

***Goldiggers, Farmers, and Traders in the "Chinese Districts" of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By MARY SOMERS HEIDHUES. Ithaca: Southeast Asia Program Publications, South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2003. 309 pp.**

自從1965年在康奈爾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之後，Mary Somers Heidhues就一直在從事有關印尼華人社會的研究，並逐漸從對國家層面的政治問題的關注（她的博士論文題目為《印尼土生華人政治》）轉變為對地方華人社會經濟的探討。《印度尼西亞西加里曼丹「華人區」的淘金客、農夫與商人》（以下簡稱《淘金客》）或許可以被視為Heidhues在1992年出版的《邦加的錫與明多克的胡椒：一個印尼島嶼上的華人社區》之續集。【Mary Somers Heidhues, *Bangka Tin and Mentok Pepper: Chinese Settlement on an Indonesian Island*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2)】兩書有幾個共同點：研究對象多為居住在印尼邊陲的華人農夫與礦工；這些人都是屬於「沒有歷史的人」，因而更需要重新建構他們的經歷；在研究視野上，既注重歷史的角度（通過使用檔案），也採用人類學的田野考察方法；它們的目的都是旨在打破有關印尼華人皆為「經濟上的成功者」這個廣為接受的迷思。

《淘金客》涵蓋了自18世紀中葉到20世紀末這兩百多年間西加里曼丹華人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三個主題：華人族群的外在關係，包括與該區域另外兩個主要族群（馬來人和達雅克人）的關係以及與荷蘭殖民者和獨立後的印尼政府的關係、華人社會與文化組織在維繫「華人性」以及幫助華人面對外來威脅時所發揮的重要作用、華人與祖籍地以及東南亞其他地方華人社群的跨國聯繫。

本書第一章介紹了西加里曼丹華人區的環境以及人口構成，他們包括淘金客、農夫、小生意人、工匠、勞工等。這些人多數是客家人，其身份認同主要以方言認同為主要標識，但他們也具有「勤奮、抱團和能吃苦」的特徵。第二、三章着重討論華人淘金客的活動及由此形成的社會政治組織。1740年之後，馬來統治者輸入大批華工開採金礦，「公司」因而成為此後一百年間最重要的華人組織。這些公司集華人商業、社會和宗教團體的相關要素，成為國中之國。它們不僅控制了相當大部份領土，而且對西加里曼丹地區的政治與社會經濟有直接影響。因此，當荷蘭人自19世紀開始逐漸擴展和鞏固它們在印尼群島各地的控制時，就不可避免地與華人公司發生衝突。通過三次的「公司戰爭」，荷蘭人最終得以打敗華人公司並確立自身在西加里

曼丹的統治。

第四、五章分析1860年至1940年間華人社區的人口、經濟變化及其政治活動。Heidhues指出，華人在近現代以原材料為主的出口導向的經濟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到了19世紀末「公司」時代結束之後，客家人開始逐漸遷往內地，並由淘金客轉型為農夫和商人。這帶來了兩個直接影響，其一，他們與居住在內陸的達雅克人發生了正面的衝突；其二，他們的商業出口活動也強化了英國殖民地新加坡在華人區域經濟中的作用以及西加里曼丹進出口經濟體的特徵。另一方面，荷蘭人開始通過華人中間人逐漸強化對華人社會的控制，並加重對華人的課稅以應付日益增加的行政開銷，這也由此構成了華人與荷蘭人關係的「癥結所在」。作者還進一步探討了華人社團、學校、廟宇在維繫華人社會內部統一中的作用並注意到文化與經濟、空間的密切聯繫。她認為，華人社會內部的一體性是與西加里曼丹出口導向經濟的離心性相關連的。對於這裡的華人而言，「巴達維亞既遙遠，又不相關。他們的關係與新加坡和中國反而更加密切。」前者主要是商業關係，而華南則構成了他們的文化中心。

第六章分析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佔領以及此後的印尼反荷游擊戰爭對華人社會的衝擊。第七章則深入討論1950年代之後土著民族主義的興起和蘇加諾與蘇哈托時期民族國家日益重要這一大環境之下的華人命運。西加里曼丹的華人開始經歷了與印尼群島其他地區華人類似的歷程，包括強迫同化政策所導致的華校和華人社團的關閉、華人被禁止從事農村地區的零售行業等等。與此同時，華人中獲得印尼國籍和講印尼語的人數也迅速增加，當地「華人性」的保持主要得益於他們與東南亞其他地區華人之間的密切的商業和社會往來。

本書的結論認為，在過去兩個半世紀中的大部份時期，「西加里曼丹的華人少數族群一直作為一個獨特的族群而存在，無論是從加里曼丹地區來看還是與其他地區與華人社群相比較而言」。而維繫這種獨特性的關鍵是華人的社會、宗教、商業和政治組織。因此，作者強調「空間上的孤立性和經濟上的特殊性比客家人文化更能夠解釋西加里曼丹華人文化得以傳承的原因」。與此同時，1950年代之後華人也形成了新的多元的身份認同，他們認為自己既是印尼人，也是華人；在新世紀之交，「他們希望像其他印尼人一樣在印尼的框架之內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華人社會機構與文化的保存與發揚光大並不會使他們脫離這一大框架」。

本書花了近十年的功夫完成，採用了大量的檔案和廣泛的田野考察資料，尤其是荷蘭文和印尼文的官方記載、西方人的遊記、以及少部份的中文二手資料。口述歷史訪談以及參與性觀察也構成了本書分析（尤其是戰後部份）的重要資料來源，這反映了歷史學與人類學方法的有機結合。從論題的分析上，作者既注重華人社會的內部結構以及變遷，也將之放在與馬來人、達雅克人（Dayaks）、荷蘭人和印尼政府之間的多重互動之下加以探討，從而彰顯了華人社會的自主性與結構上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本書寫成於民族國家的時代，但並未將這種政治形式視為一種歷史的必然性和與生俱來的產物，而是強調華人族群性如何在跨國的環境下，透過與新加坡、砂撈越華人的經濟活動和文化交往被深化。因此，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歷史，但同時也是一種由外而內的進程。

本書的主要缺陷有兩個。其一，作者認為華人社團對華人性的延續與保存起了關鍵的作用；然後，隨着1950年代至1998年蘇哈托垮臺為止，華人文化被人為地扼制，社團、報刊、學校都先後被關閉。在這種新形勢下，「華人性」的依託何在？作者也強調了當代印尼華人認同與印尼國家認同之間的共存；但是，他們如何共存？其主要策略是什麼？這兩種不同類型的認同的主要差異如何被協調？作者對這些相關論題並未闡述。其二，作者對華人社群的重要性甚為關注，這也是本書的核心論題之一；然而，在資料上她主要依賴的是荷蘭人檔案和西方人遊記的相關記載，這難免有失偏頗。如同印尼著名作家普拉姆蒂亞·阿南達·杜爾所言，荷蘭檔案資料所建構和反映的是一個「玻璃屋」（House of Glass）——殖民者由外及裡來觀察、掌控屋中的人物（土著或華人），因此，後者的觀念、情感、選擇肯定無法在這些檔案中獲得全面而真實的反映。其實，有不少華人檔案和會刊對自身的觀念和策略有詳盡的描述，可惜由於客觀原因作者未能採用。在這方面，對西加里曼丹華人社會內部結構，尤其是「公司」感興趣的讀者，或許可以從袁冰凌的近著獲得更多詳盡的資料與分析。【Yuan Bingling, *Chinese Democracies: A Study of Kongsi of West Borneo* (Leiden: Research School of Asian, African, and Amerindian Studies, Leiden University, 2000)】

劉宏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國學系